

唯一一部出自家學的斷代史“正史”

——《漢書》導讀¹

馬 彪

歷代學者喜將《史記》與《漢書》進行“馬班異同”的比較，而且多持褒馬貶班的態度。其實，《史》《漢》之間有可比之處，也有不可比之處；至少從前者為中國第一部通史，後者是中國第一部斷代史的角度來講，二者並列第一，各有所長，很難論定孰優孰劣！

所謂斷代史，是以朝代為斷限的史書，即記述一個朝代歷史的史書。東漢著名的史學家班固等人編纂的這部《漢書》（又稱《前漢書》）就是中國第一部斷代史，而且是二十四史中唯一一部出自家學的斷代史著作，其價值不容低估。

一、續寫《史記》風潮中成書的斷代史《漢書》

自古以來中國人喜歡記述歷史，這一習慣形成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無論如何與司馬遷創立《史記》（嚴格地說魏晉以前叫《太史公書》）的成功是分不開的。至少，司馬遷的《史記》一經問世就製造了大批的“粉絲”。又因為《史記》只寫到漢武帝太初年間，而且很快出現缺失，所以在西漢那些愛好《史記》的“粉絲”中有一位元帝、成帝之間的博士褚少孫已經開始續寫《史記》了。從此以後續寫《史記》者不斷，如成帝時的揚雄及劉歆、陽城衡、史考山等。

後來班彪也起了續寫《史記》的動念，他認為當時雖然有着各種對《史記》的續寫，但多為鄙俗之作，缺乏繼承太史公的文才，所以他要親自續寫《史記》。然而，到了他兒子班固的時候，開始那種續寫《史記》後篇的想法發生了變化，最終寫出了《漢書》。也就是說班彪確實是希望寫《史記》的續篇，但是班固則上自漢高祖下至西漢結束，將這二百三十年間的史事撰述為《漢書》。《漢書》雖說大體沿襲《史記》的體例，但是最大的不同在於：與《史記》的通史體例相反，《漢書》是斷代史。

二、《漢書》是學問世襲制時代的家學撰述

《漢書》本是班彪、班固作為家學開始編纂的，這一點與《史記》作為司馬談、司馬遷的家學創作而成書是同樣的，這是古代學問世襲制時代的必然產物。雖說中途加入了朝廷的干預，還有馬續

¹ 執教秦漢史多年，常有學生來問如何讀《漢書》的問題，深感有作《漢書》導讀之必要，故為之。

等人的幫助，但從撰述旨趣到主要執筆人來說，《漢書》無疑仍是一部家學的撰述。當然，《漢書》所記漢武帝以前的部分來自於《史記》，但那也是史家司馬氏的家學作品。二十四史中唯有《史》、《漢》出自家學，正是周代至兩漢的中國古代學問大多出自家學的具體寫照。

無論如何班固是《漢書》的主要作者，所以就像通常以司馬遷為《史記》作者一樣，人們提到《漢書》的作者時但稱班固。班固（公元三十二至九十二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人，自幼聰敏。九歲能作文章，誦讀詩賦，博通群籍。他二十三歲決心繼承父業，在班彪生前所撰《史記後傳》六十五篇的基礎之上編纂了《漢書》。然而，公元六十二年因有人誣告他“私作國史”而被捕入獄，書稿被查抄。後來他的弟弟班超上書漢明帝，為其兄申辯。明帝因此閱讀了書稿，十分欣賞班固才能，反而任命他為宮廷圖書館的蘭臺作令史，負責校勘宮廷圖書館藏書，還讓他繼續撰寫《漢書》。前後經過三十年左右，正當班固就要完成《漢書》之際，他又因為將軍竇憲事件受到牽連，再度被捕並且死於獄中。班固去世後，尚未完成的八表和《天文志》，由其妹班昭（曹大家）續成。班昭也因此成為二十四史作者中唯一的女性。

三、《漢書》在體例上對《史記》的模仿與創新

通行本《漢書》是唐代顏師古的注本，共一百卷，但因為有些卷又分為幾卷，所以總計一百二十卷，即《本紀》十三卷、《表》十卷、《志》十八卷、《傳》七十九卷。

《漢書》的體例是模仿《史記》而又有所發展的。《史記》有本紀、表、書、世家、列傳，《漢書》則有帝紀、表、志、傳。如果說《漢書》把《史記》的“書”改稱為“志”，還只是名稱更換的話，那麼班固未像司馬遷那樣設立“世家”，而是將所有功勳世家一律列入人物“傳”之中，則不能不說反映出東漢人的世卿世祿觀念，較比西漢人已經大為淡薄了。

《漢書》的創新很多，比如新設的《刑法志》不僅記述了漢代刑法，還概括了漢以前的刑法源流。他的這一筆法雖然遭到過後代史學評論家的非議，但是從今天的史學概念來看，這種追根溯源的敘事方法不妨說更具合理性。《漢書》將《史記》的《貨殖列傳》和《平準書》合二為一，創立了《食貨志》，將人口數量、耕地面積，糧食產量等重要的國家經濟數據按照“食”與“貨”即今日我們說的農業與工商業分類的做法，為後來歷代史家所認同並予以繼承。班固還根據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圖書分類法，創立《藝文志》並由此開闢了後代史書設立《藝文志》或《經籍志》的先聲。此《志》的創造，無疑是中國所以能夠一直保持世界圖書之最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地理志》的創立也是後代史書紛紛效法，並設立《地理志》、《郡縣志》、《州郡志》、《地形志》的樣板。

就《傳》而言，《漢書》新設了《史記》所沒有的《宗室傳》、《皇后傳》、《外戚傳》；在《表》中增設了《古今人表》。《王莽傳》的篇幅很長，是史書中記載新朝的唯一史料，其價值不可低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漢書》中增補了許多民族史和中亞、南亞史的內容。這反映出漢武帝之後中國

人越來越具有國際化的眼光了。

《漢書》多載西漢皇帝詔文，為後世留下寶貴的第一手史料，極有助於學者的研究。比如漢武帝對賢良“下詔策問”的內容，如果沒有《漢書·董仲舒傳》的記載，我們將很難如此詳細地了解漢武帝下詔求賢具體情節和心情。

四、《漢書》研究成果及其代表性觀點

由於《漢書》與《史記》的繼承關係，歷代學者對《漢書》的研究僅次於《史記》。比如劉知幾評論所謂紀傳體時，就指出雖然這一體例始於《史記》，並成為後代正史的楷模；但是斷代史卻開始於班固，後代的史書大體都繼承了班固的體例。與劉知幾的稱讚相反，鄭樵認為史書本應以通史為正常體例，他批評班固著斷代史是不明《史記》本意，沒有明白歷史自有其古今沿革相因的意義（《通志·總序》）。

鄭樵還對《漢書》的“表”予以了強烈的抨擊，他認為“表”本來是作成“旁行邪上”²形式，在其中按照時代、年代、國家、事件填入事實，以便一目了然的方法。但是班固不通“旁行邪上”，像《古今人表》那樣將人物劃分等級的表格沒有任何意義。劉知幾也認為《漢書》既然是寫漢一代之事，像《古今人表》那樣從上古開始記載古今名人的方式是不合體例的。不過，清代章學誠卻認為，的確此表從史書體例來講並不得當，但是作為史料是有利用價值的（《文史通義·史篇別錄例議》）。

方苞認為《漢書》中寫得最好的是《霍光傳》，其中將霍光侍奉武帝二十餘年概括以為人謹慎的結論；而對其身為昭帝丞相的經歷，僅概括為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寥寥數語，記述言簡意賅。對霍光死後的宣帝時霍氏一族雖蒙難而亡，卻詳細寫出了其遇難的原因。他認為這樣的記載詳略適宜，相當出色。方苞還認為《王莽傳》可謂班固用力最深者，其中對王莽陰謀篡位之始末的巧妙記述，可比司馬遷的筆法。但認為班固對漢代朝廷制度、儀式一般是不予詳述的，而《傳》中卻對王莽設立的官制、地名一一記載則實屬不必。

趙翼《廿二史劄記》中指出：從司馬遷的通史一變為班固的斷代史，其間史書的撰寫方法亦為之一變；又加上後代都模仿班固模式，這防碍了史家自身特点的發揮。在《史記》與《漢書》之間不長的時期內，出現了明顯的時代區分，於是司馬遷的《史記》成為了空前絕後的作品，而班固的《漢書》也為後代著史提供了典範。

² 關於“旁行邪上”的表形式，參見馬彪《戰國秦漢簡帛中所見“表”及其“旁行邪上”特徵》，『山口大学文学会志』第63卷，2013年2月。

五、推薦閱讀的篇章以及所用版本

出於文字篇幅的限制，本文僅推薦並介紹《漢書》中有代表性的十八個篇章，以期放映全書的梗概和旨趣。比如，《漢書》記載的武帝之前的部分主要是抄錄《史記》的，爲了避免重復這裏僅選摘了此後的內容。

《本紀》中必須推薦的是《武帝紀》，是因爲作爲秦漢帝國的代表人物的“秦皇漢武”之一的漢武帝，他在位五十四年（前一四一-前八十七），佔西漢二百餘年的四分之一，而且是漢帝國領土、制度、文化、思想得以穩定的主要時期，有着承上啓下意義的關鍵年代，是全書的主幹。

在《漢書》諸表中，本文推薦《異姓諸侯王表》、《諸侯王表》、《王子侯表》三表的“序”。大家都知道，西漢與秦朝最大的不同，在於部分恢復了諸侯分封制，即以“郡國制”取代了秦的“郡縣制”。而當時的諸侯、封國又不外以名臣將相爲代表的異姓諸侯王、劉氏皇族的同姓諸侯王以及王子諸侯三類。班固對於這三類“王”與“侯”的概述又集中體現在三表的“序”中，讀者僅用暫短的時間，就能領略到郡縣制與封國制並存的時代特點。

《地理志》是本文所推薦的唯一一篇《志》。其中記載了漢帝國的行政區劃、歷史沿革、郡國戶口、山川河流，讀者可以從中體會到上述“郡國制”存在的空間範圍，以及各地風土人情的豐富多彩。《志》中以星空的分野劃定地理區劃的傳統方法，一方面準確地反映了兩千年前的我們祖先天文、地理知識的豐富，一方面對現代人的環境意識也不乏借鑑的意義。

紀傳體中的“傳”都是圍繞“紀”的展開，讀者從《武帝紀》中領會了漢朝盛世的歷史大綱之後，肯定希望對當時爲漢朝做出貢獻的名臣武將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蘇武傳》描述蘇武身陷異國囹圄十九年，持節不屈、不辱使命的悲壯經歷。《董仲舒傳》詳細記載了漢武帝爲建設新型帝國求賢若渴，董仲舒三上對策爲日後文人治政開闢新途的歷史情節。通過《張騫傳》的內容，讀者可以了解古人跋涉千山萬水，開拓絲綢之路的艱辛壯舉。《朱買臣傳》通過一個實例告訴讀者：當時只要努力，讀書-入仕-致富的路徑對任何人都是敞開的。《主父偃傳》、《東方朔傳》、《霍光傳》三篇從不同的側面，記載了武帝身邊所匯集的各種各色官僚的生動場景。

漢武帝過度消耗國力之後，漢帝國進入了西漢後期。漢昭帝、宣帝時期（前八十七-前四十八）是一個恢復性穩定發展的階段，即所謂的“昭宣中興”時期。《趙廣漢傳》通過對一名以“廉潔”出名，努力爬至高級官僚，最終被處以“腰斬”之京官自我經營的一生，記述了當時一幕亦廉潔、亦骯髒的官場現形記。此文想必現代人看後也會多有讀後感觸。《張禹傳》講述了張禹這位西漢後期讀書人中的皎皎者。從他身上讀者定會領悟出當時社會上所流傳“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漢書·韋賢傳》）諺語所表達的意思。

所謂《列傳》就是將幾個有相同性格的人物列爲一組，藉以凸現一個時代的某種時代風格。《循吏傳》、《遊俠列傳》、《佞幸傳》雖說都是對《史記》同類傳的模仿之作，但其中補進的漢武帝中期以後的那些人物，使我們得以對西漢各類官場、民間人物有了較全面的了解。比如，從《龔遂傳》

中渤海郡太守號召人民賣刀劍、買牛羊，發展農業，全郡大治的事跡，讀者可以明白，任何時代的官僚中雖然會有腐敗分子的出現，也不乏優秀的地方官。從《原涉傳》中西漢末豪俠原涉的事蹟，讀者從原涉身上看到漢代活躍於地方的英雄豪俠們的那些行俠仗義的俠士風範。從《董賢傳》中漢哀帝與佞臣美少年董賢之間離奇的君臣關係，任何讀者都會發出這樣的哀嘆：國家掌握在如此愚君、佞臣手中，不滅亡才怪！

西漢末年，權臣王莽以不流血的“攝政”方式取代了劉氏政權，我相信任何一個不以姓氏論正統的現代人，都會對《王莽傳》中的記載給出自己的看法。這不但是《漢書》中最長的《傳》，而且採用了編年體例，所以這實際上是一篇《紀》。事實上，後世欲了解王莽新朝的歷史，全憑此篇文字。可見，這一篇記載具有多麼重要的價值。

如上所述，《漢書》自成書之時起就有人感到閱讀艱難。為此，從東漢末至唐以前為《漢書》做注的就有不下二三十家。唐初顏師古的注能夠廣攬兼收、糾謬補缺，可謂歷代注釋《漢書》的佼佼者。清末王先謙的《漢書補注》則更是對前人各注的集大成之作。若希望深度閱讀《漢書》的話，這兩部注解是極好的本子。現代學者對《漢書》的研究代表作，例如楊樹達《漢書窺管》從文獻學的角度多有訂繆之處；陳直《漢書新證》則是利用漢簡、銅器、漆器、陶器、封泥、漢印、貨幣、石刻資料考訂、印證《漢書》的力作。

本文所選篇章根據的是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這個版本以王先謙《漢書補注》本為底本，參校了其他較好的版本，吸取了前人的考訂成果，是一個便於閱讀的本子。

六、閱讀《漢書》時應該注意些什麼

《漢書》從來被認為是史書中難讀的一部，作者喜歡用古字、難字的風格為閱讀者平添了很多不便。就連東漢時期的學者也“多未能通者”（《後漢書·班昭傳》）。所以，歷代學者在注釋《漢書》的字義、讀音方面，沒少下功夫。作為現代讀者的我們，讀此書時就更是離不開注釋的“拐杖”了。但是，由於其結構模仿《史記》，即對於司馬遷所創“紀傳體”忠實地予以了繼承，所以從全書構架上《漢書》也有容易理解的一面。對這一點，讀者只要抓住《帝紀》十二卷之“經”，《表》八卷、《志》十卷、《傳》七十卷之“緯”的特點，稍稍參考注解和翻譯閱讀的話，其實並不很難，甚至多有引人入勝之處。正如范曄所論“（班）固文贍而事詳。若（班）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臺臺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後漢書·班彪列傳》）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班固畢竟不像司馬遷是當代人記載當代史，所以有時會出現考證不嚴謹，甚至以後代之事竄入前代記述的情況。比如，西漢時期的標準容器或容量單位是“桶”和“石”而不是“斛”。“斛”作為容器或容量單位，本是王莽改制時的復古之舉，在西漢時期並未作為標準“量”使用。但是《漢書》作者卻將西漢的“桶”和“石”一律寫為“斛”，其影像至今仍殘留不去。又如，秦憲公本秦文公之孫，而《漢書·古今人年表》誤為文公子，疏於考證。又如《漢書·武帝

紀》(建元六年〈前一三五〉)“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大司農：官名，掌租稅錢谷鹽鐵及國家財政收支。大司農官名始於武帝太初元年（前一零四），在此三十年之後，此時當稱“大農令”。《漢書》時有以後代名稱竄入前代之誤，此其一例。另外，《漢書·楚元王傳》中載“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櫛”，說秦始皇陵的棺槨被牧羊童燒毀的說法雖然現在尚不能肯定一定有誤，但根據目前考古學者對秦始皇陵的勘查來看，還是存疑為妥。

若以《漢書》的《序傳》與司馬遷《史記》的《自序》相比，是有不合體例之處。比如像他把自己的作品《幽通賦》、《答賓戲》這些與著述《漢書》毫無關係的辭賦寫入了《序傳》，相反對其父班彪以來作為家學的史學主張則沒有予以充分表示。因此，從今日的立場來看，《後漢書·班彪傳》的記載比班固的《序傳》其實更能反映《漢書》的著述主旨。班固的《序傳》在這一點來說，僅僅是一種裝飾，沒有充分地表達自己著作的宗旨。

七、十八篇推薦篇章的導讀

由於《漢書》自古就被認為是史書中閱讀難度較大的作品，所以了解其中代表作的梗概，對於讀者來說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這裏，就對紀、表、志、傳中有代表性的十八篇略作介紹，提供讀者作為試讀材料。

1、《武帝紀》

由於《史記》今上本紀原文已佚失，現在所見到的《史記·孝武本紀》是褚先生（少孫）根據《封禪書》補出的，所以《漢書·武帝紀》是非常重要的文獻資料。其中記載了漢武帝劉徹，公元前一四一年繼位，公元前八十七年去世，在位五十四年的主要經歷。諸如他加強皇權，頒行推恩令，制定左官律，削奪諸侯王權力；下詔令全國各郡縣向朝廷推舉賢才，以策問等方式選拔人才，起用董仲舒、公孫弘等賢才入朝。他改革幣制，官營鹽鐵，實行均輸、平准制度，重視水利，治理黃河。他罷黜百家，尊崇儒家，“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促進了漢文化的繁盛，奠定了儒家思想在我國傳統社會的正統地位。對外，武帝征伐並趕走匈奴，解決了北胡侵擾之患；派張騫通使西域，正式開通了漢朝與西域的聯繫；他征服閩越、東甌與南越，經營西南夷，在朝鮮半島設置郡縣，創造了空前的大一統帝國。漢武帝有功有過，功勞之一是他敢于宣佈承認錯誤《輪台罪己詔》（參見《漢書·西域傳》）。

2、《異姓諸侯王表》（序）

此表以時間為經，以王國為緯，立了漢、楚、衡山等二十欄，列述了漢元年一月至文帝后元七年項羽所封十八王和劉邦所封異姓八王的置廢興亡。表的格式及內容都襲取《史記》的《秦楚之際月表》及《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也是以漢五年劉邦稱帝為分界，分前、後兩部分。前部分是按月

分欄的記事；後部分按年記事，自漢元年至文帝後元七年長沙國除為止，續記異姓諸侯王的置廢興亡。這篇表序中，簡要地說明立表宗旨及本表的主要內容。

3、《諸侯王表》（序）

本表記載的是西漢二百年間劉姓諸侯王的置廢興衰。表的形式及內容都與《史記》的表有很大不同。《史記》表以時間為經，以王國為緯，按年代記漢興至太初百年間劉氏政權所封異姓和同姓諸侯王盛衰遞變的情況。本表只摘取《史記》表中有關同姓諸侯王的內容，又增加了天漢至漢末有關劉姓諸侯王的情況；它以諸侯王為經，以諸侯王的世系為緯的形式可謂脈絡清晰。設立號諡、屬、始封、子、孫、曾孫、玄孫、六世、七世等欄，以記劉姓諸侯王的世系及其存亡繼絕，這與《史記》表是大異其趣的。此表序還總結漢代分封諸侯的歷史經驗，認為漢初分封同姓諸侯以代替異姓諸侯很有必要，只是矯枉過正，藩國自大，於是要削藩；但削藩也過了頭，以至“本末俱微”，被王莽篡權亡漢。作為史家他指出“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是為了“明監（鑒）戒”的道理。

4、《王子侯表》（序）

《王子侯表》分為上下兩表，這是班固的特意編排。由於西漢元帝在位的十六年間未封王子侯，所以《漢書》將此後的情況列為《王子侯表下》，以此提示讀者西漢分封諸侯的制度已經衰微。“居攝”，即因皇帝年幼不能親政，由大臣代居其位處理政務。作者出於正統論的立場，“弗錄”王莽代行皇權的“居攝”三年（公元六至八年）之間所封的王子侯，因而人為地造成史料的空白很可惜！

5、《地理志》

文人讀此篇可知古代人文分佈，商人讀此篇可知當年天下之物流，百姓讀此篇可知家鄉之遠古風土。正如學界所公認的那樣，這是中國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地理著作。它對西漢代郡縣封國的建置，以及各地的山川、戶口、物產、風俗和文化等作了綜述，保存了漢代及其以前的許多珍貴的地理資料。它不但是中國地理學史上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而且開創了歷代正史都以疆域政區為主體、分錄各區山川物產疆域地理志和沿革地理的體例。

6、《蘇武傳》

《漢書·李廣蘇建傳》的傳主為李廣與其孫李陵、蘇建及其子蘇武四人，班固將漢朝四位匈奴戰爭中的重要人物合為一傳，其褒貶之意明顯。即認為李陵被捕而投降匈奴是可耻行為，蘇武未屈服單于，被流放於北海無人之地，仍持漢皇帝信節牧羊而值得讚揚。同樣是記述西漢的歷史，班固與司馬遷的價值觀之所以不同，如實反映了東漢儒者崇尚名節的時代風氣。本篇講述了蘇武在漢武帝天漢元年（前一零零年）奉帝命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十九年，持節不屈的艱辛經歷。

7、《董仲舒傳》

漢武帝是一位通曉經學的皇帝，即位時年輕有為，不滿足於漢初清靜無為的統治方式，而起用了一批好儒的大臣，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隆儒”局面。當此之時，爲了全面開拓大一統新局面，漢武帝急需尋求理論依據。建元元年（前一四零）武帝下令薦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表明他對人才的渴望。經學大師董仲舒正是在這時獻上著名的“天人三策”，從而一舉成爲後代儒者所尊仰的“儒宗”。《董仲舒傳》即爲後人留下“天人三策”的第一手材料。欲知中國傳統社會“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形成之緣由者，《漢書》此篇是絕對不可不讀的！

8、《張騫傳》

張騫是我國古代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在漢武帝對匈奴戰爭中，張騫兩次奉命出使西域，肩負了聯絡西域各國共擊匈奴的使命。第一次於建元二年（公元前一三九年）出使月氏，他冒險經匈奴被扣留十餘年，後乘機西逃，經大宛、康居，到達位於阿姆河上中游的大月氏和大夏，返歸時又遭匈奴扣留。行程數萬里，歷時十三年，歷盡艱險終於回到漢朝。第二次為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張騫再次出使西域，他率領龐大的使團，攜帶價值數千萬的財物，跋涉萬里，抵達位於伊犁河流域的烏孫，然後又分別派出副使前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國。張騫兩次出使，加強了中原與西域各族的聯繫，發展了漢朝與中亞各國人民的友好關係，極大地促進了我國與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

9、《朱買臣傳》

本傳記載了朱買臣從一介砍柴樵夫，忍受貧寒甚至妻子離去的困厄，通過讀書求取功名，最終取得榮華富貴的事跡。他的事跡後來被民間廣泛流傳，甚至演變為“負薪挂角”、“覆水難收”成語。如果讀者有意識地結合上面的《武帝本紀》、《董仲舒傳》一起閱讀的話，一定會品味出這樣一個道理：兩千年前的秦漢帝國之所以能夠成爲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座豐碑，人民地位的空前提升，無疑是這個時代的一大生命源泉。

10、《主父偃傳》

主父偃可謂漢代識時務者的典型，他看到漢武帝重用儒生，就中年改讀《易》、《春秋》，而且目的明確：志在當官。爲此，他忍受士人、諸侯賓客的排擠，單身獨闖京城；他知道武帝喜歡破格錄用人才，就以平民身份直接到皇宮毛遂自薦，竟然成功；他知道武帝的心病在於如何遏制諸侯、豪族勢力和解決進攻匈奴的糧草問題，就先後提出“推恩”、“遷豪”、“築朔方”等急用先行的方案，深得皇上的歡喜。然而，他私心過重，辦事矯情，曾經一年四次連升的官場幸運兒，最終不免遭遇滅族極刑。本傳用不長的文字，刻畫了漢代官場中主父偃那惡人俊傑的生動形象。

11、《東方朔傳》

東方朔（前一六一或一六二-前九三），西漢辭賦家。漢武帝少年即位，破格錄用士人。東方朔自薦，受詔拜為郎。他博聞強記，思維敏捷，言詞詼諧，滑稽幽默，因此得到武帝的寵愛，他也借此時常犯顏進諫。《東方朔傳》中欺騙戲弄侏儒、射覆猜字、拔劍割肉、直諫武帝微行和修建上林苑、痛斥董偃以及醉酒遺尿殿上等片段都很精彩。讀者可從中感受到兩千年前漢帝國朝中一種很特別的君臣關係。

12、《霍光傳》

霍光，生於漢武帝元光年間地方上一個小縣吏之家，因為時將軍霍去病的異母弟纔有機會進入朝廷。他侍奉武帝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武帝臨終前下詔託孤，要他效法周公輔助幼主漢昭帝。由此他輔佐昭帝、宣帝，執掌朝政長達二十年。霍光以“匡國家，安社稷”為己任，執政期間採取了竭盡心力維持了西漢朝從武帝期向後期的平穩過渡，達成了“百姓充實，四夷賓服”的政績。開啓了漢帝國和平攝政的範例。

13、《趙廣漢》

趙廣漢是西漢宣帝時期名望頗高的京兆尹。史稱他為京官不畏豪強，瓦解朋黨，政績顯著。《本傳》從趙廣漢在地方為吏以“廉潔”出名，到做京官政績顯著“吏民稱之不容口”，記載到最後以“催辱大臣”罪名被處以“腰斬”的結局。文中所描述京兆尹趙廣漢侵犯貴戚、善待下屬、辦案如神、眼綫密布、栽培死黨，雷厲風行、官場失足等情節環環相扣，歷歷在目。本傳的結尾處，“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的請願場面的推出，更是烘托了趙京兆以精明強幹深得京城民心的一幕！

14、《張禹傳》

張禹是以精通《論語》的經學家身份當上天子老師，從而晉升為丞相的。他不愧為西漢後期讀書人中的皎皎者。班固將他與匡衡、孔光、馬宮等儒官合為同一列傳，由此反映了自漢武帝興儒學以來，諸儒生因通經文而居權位的現象。正如當時社會上所流傳“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漢書·韋賢傳》）的諺語所表現的，讀書做官已成為一種時尚。讀者從這一傳記中可以很具體地品味西漢末年的儒官形象。

15、《龔遂傳》

宣帝時循吏龔遂是《漢書·循吏傳》所載六位傳主之一。所謂循吏是指那些守法循理的清官。龔遂通過明經取士之途為官，先事昌邑王，以直言進諫、面刺王過而知名；渤海地區飢荒造成人民造反，他臨危受宣帝之命，擔任渤海郡太守，以靈活政策平息叛逆，安定民心，一改齊地奢侈習俗，鼓勵農業生產，全郡大治。可謂漢代優秀地方官的代表人物。

16、《原涉傳》

此傳出自《漢書·遊俠列傳》，記敘了西漢末豪俠原涉的事蹟。原涉本是官宦世家之子，性溫仁而內忍，因父死辭讓賻送而聞名，棄官報殺叔父之仇，親自為閭巷貧民殯殮，大修墓冢自建“原氏仟”神道，以劍貫耳向縣官謝罪等等。讀者從原涉身上看到漢代活躍於地方的英雄豪俠們的那些行俠仗義的俠士風範。

17、《董賢傳》

這是《漢書·佞幸傳》中的一篇，傳主是西漢哀帝年間年僅二十出頭的美少年董賢。董賢本是一個在殿下傳漏的卑微舍人，因美貌而受寵，竟然封侯拜爵，官至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司馬。從哀帝見其美貌而傾心、同床共寢、封侯此官、賞賜無度、縱容包庇的記述中，讀者不難懂的一個道理，即寧用奴才不用人才之過錯，不在奴才而在用人之人。

18、《王莽傳》

作為歷史人物王莽從來就是被否定的對象，甚至於他所創立的新朝也不被學者所承認，而僅僅用“王莽篡漢”一詞一筆帶過。然而，作為史家《漢書》的作者還是為他長文立傳。後世了解王莽其人其事多賴此文。《傳》不僅記述了王莽如何謙卑、節儉、勤學、鑽營最終登上皇帝寶座而建國的歷程；而且大量記載了王莽復古改制的具體內容，以及改制失敗和新朝滅亡的經過。史料價值極高。

八、《漢書》名篇名句賞析與點評

《漢書》中有許多經典的名篇、名句特別有欣賞價值，此僅就上述推薦篇章的內容，略作摘錄和點評。

《武帝紀》載：“（元光元年〈前一三四〉）五月，詔賢良曰：‘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於篇，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武帝十五歲（前一四一）即位，開始的五六年間朝政實權掌控於祖母太皇太后竇氏手中。竇氏喜好黃帝、老子之學，強制推行黃老之學。但輔佐年輕武帝的丞相竇嬰，雖說是竇氏一族成員，卻有推崇儒學表現出異端傾向。他與皇太后王氏的異父弟太尉田蚡等一同推舉儒者，由此策劃上奏不經太皇太后竇氏。此舉觸怒太皇太后，不但造成丞相竇嬰、太尉田蚡被罷免，從武帝日後推行崇儒政策的角度來看，也可以說是他即位伊始所遭受最初的挫折。所以說太皇太后竇氏死後的翌年，武帝就迅速推出詔令賢良對策，可謂他獨自掌權之後的第一舉措。

《武帝紀》載：元朔元年詔中引用了孔子“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一語。歷代學者對《論語·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師”的解釋有同有異。比如對“三”字有解釋為“衆多”的，也有解釋為數字“三”的；對於“行”字有解釋為“同行”的行走之意，也有解釋為“言行”之“行”的。前者用為動詞，後者用為名詞，都講得通。漢武帝詔文中的“三人並行，厥有我師”，則是說三人並排行走，其中就有我的老師。漢代人對《論語》的解釋由此可見一斑。

《地理志》記載了漢代人對“風俗”一詞的解釋。其實，在孔子提倡“移風易俗”之後，歷代學者對所謂“風俗”的含義多有闡發，東漢應劭還專題撰寫了《風俗通義》。《漢書·王吉傳》稱“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這是渾言“風俗”即習俗之意。然而，析言的話究竟何謂“風”，何謂“俗”呢？這裡說“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但元朝李果《風俗通義》題辭中則說：“上行下效謂之風，眾心安定謂之俗。”二者之間差異明顯，為有心的讀者留下一個小小的疑問。

自古所謂“鄭衛之音”被有靡靡之音的惡名，《地理志》將其歸結為“桑間濮上之阻”的地理原因；《禮記·樂記》甚至說：“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不論觀點正確與否，讀者至少可以由此悟出些許古人的人文地理見識。古時男女多選擇桑林或河畔為約會的地點，不也足以令關在都市“牢籠”裏的現代人羨慕嗎？

自古君王始即位不稱“一年”而稱“元年”，這是為什麼呢？董仲舒引經據典，從《春秋》講到《周易》，道出的關鍵一句話，即“正本清源”纔是“元”的本意。按今天的說法就是：籠統地講“一”與“元”的確是同義詞，但“一”畢竟是數字，“元”則上升為哲學，有着萬物之始，世界本源的意思。後者的寓意更深厚。的確，現實生活中有說“慶祝元旦”的，未聽說有“慶祝一旦”的，箇中道理兩千年前的董大學者早有高論。

武帝時期的郎中主父偃，經常靠揣摩武帝心意上奏告發他人，大臣們都懼怕他的伶牙俐齒，行賄他的財物累計達千金。有人規勸他說：“你太驕橫了！”主父偃竟說：由於“日暮途窮”，即時間不多了，所以要“倒行逆施”即不擇手段地貪污、陷害，以致中飽私囊。中國官僚史上，貪官污吏層出不窮，如此直白地袒露為非作歹心境者恐怕並不多吧！

東方朔以詼諧滑稽著稱，而且名垂史冊。班固是有過在朝廷伴君如伴虎經歷的人，從所謂“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的評論，可知他深深地理解東方朔對皇帝“直言切諫”時的小心謹慎；而他所謂“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的概括，不也正告訴我們所謂“敖弄”，不過是東方朔在官場鬥爭中所採取的一種自我保護方式而已嗎！

霍光在武帝時期“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在昭、宣帝時期“秉政前後二十年”。如果說前二十年可以用“小心謹慎，未嘗有過”一筆帶過的話，他在後一個“二十年”中對漢帝國的貢獻是絕對不可低估的。霍光所接受的託孤，哪裏只是平常一段賢臣輔幼主的故事可以了卻的：漢帝國新拓廣的巨大疆土如何維持，連武帝自己也後悔不該的勞民傷財局面如何收拾，還有如何控制皇族荒淫腐敗日益的蔓延等等。無論如何史稱的“昭宣中興”或“西漢中興”，如果沒有了霍光是不可想像的！

《趙廣漢》中評價趙廣漢“為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一句耐人尋味。班固並未像後世那樣簡單地將趙廣漢譽為廉潔奉公的模範、京官難當的典型，而是將趙廣漢嫺熟的官場手腕歸因於其超乎尋常的“天性”，而這一“天性”又是以他強悍的“為人”作前提的。如此為讀者揭示了非有非常之人難治非常之地的古代官場現形記。

自漢武帝開闢明經取士之途，公卿中儒者的比例大幅度上升。元帝開始的西漢各代皇帝更是崇儒有加。漢成帝以後的十八位丞相中竟有儒者十四人。班固在《張禹傳》的《贊》中稱他們“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居宰相尉”是儒者通經入仕的光輝頂點；“持祿保位”則是儒者由官僚致富以後的新貴族立場。

遊俠階層在漢代很活躍，所以《史》、《漢》均為之立傳。這些人是民間的特殊社會，按照原涉的話說是“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換言之，他們知道自己是“黑社會”，卻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們為何能受到民衆的誓死擁戴呢？“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的精神絕對是一個重要原因。要看到在那些國家的法律、制度不能發揮作用的角落和時刻，身邊的那位利他主義精神者纔是最可信賴的。日後中國的宗教不就是這樣逐漸形成的嗎！

漢哀帝因男色董賢的美貌而寵愛之，由此班固指出“柔媚之傾倒人心，不單單是女色，男色亦然。”愛美，甚至唯美，乃人之常情。然而“人”又是融道德、知識、愛三位一體的生物。如果不以道德、知識掌控愛欲的話，就“個人”而言充其量不過傷害一人、一家而已，若是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當權者亦即“法人”的話，“親愛諂媚小人”的結果，必將是“不任賢近仁”，以至禍國殃民。不僅如此，班固還明確指出所謂傾國傾城的禍水，與性別沒有必然關係！

（馬彪：山口大学人文学部教授）